

浙江省重点学科建设项目资助
世纪文潮学术书系

中国新文学 现实主义 形态论

王嘉良等◎著

文化艺术出版社

中国新文学现实主义形态论

王嘉良 等著

文化艺术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中国新文学现实主义形态论/王嘉良等著. —北京:
文化艺术出版社, 2002.12

ISBN 7-5039-2313-X

I. 中… II. 王… III. 现代文学-现实主义-
理论研究-中国 IV. I206.6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2) 第 104241 号

中国新文学现实主义形态论

著 者 王嘉良 等

责任编辑 王彦慧

出版发行 文化艺术出版社

地 址 北京市朝阳区惠新北里甲 1 号 100029

电子邮件 editor4@whysbooks.com

电 话 (010) 64813345 64813346 (总编室)
(010) 64813384 64813385 (发行部)

经 销 新华书店

印 刷 金华市科教彩印厂

版 次 2002 年 9 月第 1 版
2002 年 9 月第 1 次印刷

开 本 850×1168 毫米 1/32

印 张 15

字 数 370 千字

印 数 1—2000 册

书 号 ISBN 7-5039-2313-X/I·1059

定 价 26.00 元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印装错误, 随时调换。

导论

中国新文学现实主义 的形态特征

一 现实主义——需要切实面对的话题

就中国新文学思潮研究而言，恐怕没有一种文学思潮像现实主义那样遭受如此起落不定的命运了。早先，现实主义研究在中国成为一门“显学”，对其所作理论研究论著之多超过其他任何一种文学思潮。这或许是由于现实主义曾一度形成一统天下的局面造成的。雷纳·韦勒克在上个世纪60年代就指出过由于主流意识形态主宰文学创作使现实主义在苏联和中国特别兴盛的事实。他认为：“关于现实主义概念的讨论，一百多年前曾在法国引起辩论，如今又成了大家关心的题目。在苏联及其所有卫星国家，我想甚至连中国在内，‘现实主义’或者确切地说‘社会主义的现实主义’被官方规定为惟一许可的文学创作方法。关于现实主义的确切含义、历史和未来，人们进行着无尽无休的争论，发表的文章汗牛充栋，其范围之广超过了我们在西方可以想象的

程度。”^① 然而，同样令这位西方文论家始料不及的是，当一种文学思潮一统天下的格局被打破后，现实主义在中国似乎又成了最不讨巧的话题，如今流行的是现代主义文学思潮，汗牛充栋的研究文字是对各种形式的现代主义文学的讨论，对现实主义的研究倒反见出冷落的态势。这也无怪。文学研究作为对实际存在的文学现象、文学思潮的积极回应，它必须面对实际发言，20 世纪世界范围内的文学实存状况是多种文学思潮竞相争雄而又以现代主义一路领先，中国文学一旦走出封闭面对世界，人们以开放的姿态顺同世界文学潮流，不再服膺于原先的独尊现实主义，甚至表现出对这种“独尊”的反感，是完全可以理解的。

不过，我们这里想指出的是，尽管人们对现实主义有这样那样的议论，现实主义本身也有种种难以避免的局限（此种局限，在一种新的文学思潮参照下也许会更明显些），但作为一种颇有渊源且在 20 世纪依然持续发展的文学思潮，尤其是就中国 20 世纪文学的实际存在状况而论，现实主义无论如何都应该是一个需要认真面对的问题。

首先需要面对的一个现象是：从 20 世纪世界文学思潮走向看，现代主义思潮的兴起并没有形成一统天下的局面，世界文学思潮依然是一个多元并存的格局，现实主义自不应该消失在我们的研究视线之外。关于文学思潮的走向，历来有一种文学“进化论”观念，认为一个时代有一个时代的文学，文学思潮也是循着“进化”之路行进的，一种思潮在一个历史阶段里显出进步性，但随着时代的变迁便逐渐趋于“老化”，随即被另一种新兴的文学思潮所取代。如 18 世纪的浪漫主义和 19 世纪的现实主义便都

^① （美）雷内·韦勒克：《批评的概念》，第 214 页，中国美术学院出版社 1999 年版。

是各领风骚一个世纪，20 世纪就应该是现代主义的天下。我国新文学先驱者陈独秀、沈雁冰在其早期文学观念中都信守过此种理论，他们不约而同描述过文学思潮的走向是循着“古典主义—浪漫主义—现实主义—新浪漫主义（现代主义）”之路行进的轨迹，认为 20 世纪最先进的文学思潮是新浪漫主义^①。正由于此，后来成为坚定的现实主义理论家和作家的茅盾在新文学初创阶段曾对现代主义文艺思潮表现出浓厚兴趣，一度倾力宣传与提倡，甚至断言过“今后的新文学运动该是新浪漫主义文学”^②。但后来的事实证明，文学思潮的演进并不如人们想象的那样简单，是以一种思潮“取代”另一种思潮的单一线性方式行进的，其间呈现着复杂的走势；而一种思潮一旦形成，又往往有其稳定发展的一面，它并不因为别的文学思潮兴起而自动退出历史舞台，相反，因文学思潮与社会文化思潮、思想思潮的契合，它在某个时期、某个地区还会显现出继续张扬的势头。20 世纪初旬现实主义在世界文学范围内依然不减的增长势头显然给中国新文学作家以深刻的启迪，而客观的社会现实情势恰恰印证了现实主义有着不竭的生命力，于是中国新文学作家对各种外来思潮的选择偏重在现实主义一头，便是顺理成章的了。同一个茅盾，对新浪漫主义的热情礼赞有之，将其作为没落的“世纪末”文学思潮予以严峻批判者亦有之，而且前者只持续一个极短暂时间（大约三、四年光景^③），后者则长时期成为其文学思想的主导倾向。对于茅盾而言，这并非是一种随意性的选择，恰恰是其对各种文学思

① 陈独秀：《现代欧洲文艺史谭》，《青年杂志》1915 年第 1 卷第 3 号；沈雁冰《新文学研究者的责任与努力》，《小说月报》第 12 卷第 1 期 1921 年 1 月。

② 沈雁冰：《为新文学研究者进一解》，《改造》第 3 卷第 12 号。

③ 王嘉良：《茅盾与现代主义文艺思潮论析》，《茅盾与中外文化》第 200 页，南京大学出版社 1993 年版。

潮经过反复比较、筛选以后作出的抉择，其抉择的依据正是 20 世纪现实主义文学思潮的时代适应性。正如其后来最终选择现实主义所表述的：“‘五四’以来短短的文艺已经从事实上证明，有以浪漫主义出发的，有以未来主义象征主义出发的，甚至有以不知是什么主义出发的，但时代的客观的需要是写实主义，所以写实文学成了主潮。”^① 从 20 世纪世界文学思潮走向看，不但在中国现实主义是主潮，即便在欧洲、在苏联，现实主义同样有着强劲的发展势头，特别是前苏联，现实主义长期处于正统地位，直至 90 年代苏联解体以后，此种状况才有所改变。因此对于 20 世纪世界文学思潮的判断，无视现实主义文学思潮的影响力显然是不够科学的。日本学者筱田一士研究 20 世纪世界文学，有一个颇为引人瞩目的观点：“把 20 世纪小说看成是现代主义和现实主义两派根据小说创造的原点而针锋相对相互竞争的文学”，为此他排出“世界 20 世纪十大小说”，在十部小说中就既有现代主义作品又有现实主义作品，中国作家茅盾的《子夜》也赫然在列，他认为“以想象全体社会的想象力而言，茅盾在同一时代的中国作家中可谓最杰出的存在”，从而“重新确定了《子夜》在 20 世纪世界文学上的辉煌的位置”^②。这当然只是一家之言，未必具有客观真理性，正像中国当代学者将茅盾革出“中国 20 世纪十大小说家”之列也是一家之言一样。然而由此可以启引我们思考的问题是，现实主义文学思潮与文学创作作为 20 世纪文学显示出无可置疑重要性的存在，是为许多作家理论家所认同的，不独将其随意轻薄并不可取，就是缺乏对其作深层次研讨，从中总结出有益于文学发展的经验与教训，也很难说是对 20 世纪文

① 茅盾：《浪漫的与写实的》，《文艺阵地》第 1 卷第 2 期。

② 参见（日）是永骏：《茅盾小说文体与 20 世纪现实主义》，《茅盾研究》第 5 期，文化艺术出版社 1991 年版。

学思潮的完整把握。

另一个需要面对的现象是中国新文学实际，这里所展示的是中国新文学的特殊性，它在相当程度上表现出比世界范围内的现实主义文学思潮更为突出更为鲜明的色彩，因而这一点也许比前述有着更为切实的意义。在中国现新文学的整体框架内，若是从文学思潮、创作方法的角度定位，现实主义无疑占据着主流地位。对此，对作家和作品做定量分析不一定能作出精确判断，文学思潮边界的模糊性和作家创作的复杂性使得我们对某个作家或某种文学现象做出严格的思潮定位是有一定困难的，但若是从中国新文学的历史进程分析，从五四文学、30年代文学、抗战文学，直至建国以后的文学，现实主义显然一直占有主流地位。这里显示的便是20世纪中国文学同世界文学并不相同的特色。现实主义何以成为中国新文学的主流？我们认为至少有下列几个方面原因。

第一，中国的“特别国情”是滋长现实主义的适宜土壤。尽管20世纪世界文学是现代主义和现实主义两种文学思潮互争雄长，但对于中国而言，似乎并没有为现代主义提供足够的生存空间。同现代主义思潮盛行的西欧相比较，虽然处在同一个世纪，但中国人面对的问题显然同西欧各国完全不同，其间依然存在着巨大的时间落差。如果说，欧洲物质文明的高度发展，为文学作深潜的精神探索，以至于表现人的精神“危机”提供了可能，现代主义就是一种可取的选择；那么，20世纪的中国积贫积弱，人们的温饱问题都没有解决，何谈精神上的“孤独”与“荒凉”，“形而下”显然比“形而上”更能引起人们的关注，重在对社会、对现实积极参与的现实主义自然也更容易为人们所接受。正如当年周作人在谈到文艺思潮选择时所指出的：“中国的特别国情与西欧稍异，与俄国却多相同的地方，所以我们相信中

国将来的新兴文学，当然的又自然的也是社会的人生的文学。”^①正是基于此点，许多新文学作家都把翻译介绍俄国文学、弱小民族文学作为发展中国新文学的参照，鲁迅、周作人翻译出版《域外小说集》，介绍东、北欧民族文学，文学研究会多次推出被压迫民族文学专号等，都是适例。这里显示的便是因“国情”关系决定文学思潮的弃取。而多难的中国，在20世纪前半期是有增无已，20世纪后半期是主流意识形态支配文学创作，这一些都决定了现实主义在中国有着最广阔的“市场”。

第二，现实主义要求的历史使命意识、民族自省精神与中国新文学的目标及其自身发展完全对应。中国新文学开创期对文学思潮的选择及最初设定的建设目标，主要是现实主义。陈独秀提出的三大文学（国民文学、社会文学、写实文学），胡适提出的“时代文学”，其基本精神都是现实主义的。这同中国新文学革命最初是从“思想革命”角度切入，目的是在用文学实现思想启蒙，反对封建蒙昧主义，启发人们觉醒，投入争取人性解放和民族解放的斗争，是密切相关的。由此决定了在新文学开创期，文学对于社会功利性的追求要大于或重于对于艺术形式的探求，现实主义便成为一种最可取的选择。此后随着中国社会问题日益严峻，中国新文学更显出向现实主义急剧倾斜的走势，由五四时期“人的文学”，发展到30年代的“阶级文学”，再进而到抗战时期的“民族文学”，作家的历史使命意识与民族自省精神不断强化，文学创作所体现的现实主义精神也得到最大程度的张扬。

第三，现实主义精神与中国文学传统及中国作家的传统文化心理结构相契合。作为文学思潮，现实主义是在中国新文学中显出强大声势的，但作为创作方法，现实主义或写实主义却一直存

^① 周作人：《文学上的俄国与中国》，《小说月报》第12卷号外，1921年9月。

在于中国传统文学中。用写实的方法进行创作，在创作中体现了积极参与现实的精神，也可说是传统文学的主导倾向。这是由中国知识分子的传统心理结构决定的。中国传统文化是儒、释、道三家并存，而以儒家文化为正统。传统士人历来就有参与现实的精神，所谓“修、齐、治、平”乃是读书人的伦理规范。由此也便有了文学参与社会、参与现实的传统。文章是“经国之大业，不朽之盛事”（曹丕）、“文章合为时而著，歌诗合为事而作”（白居易），直至梁启超提出“小说救国”论，便都是此种精神的反映。我国的现代作家（特别是第一代作家）固然大都眼光向外，勇于接受世界文学新潮，但他们除了精通“西学”外，同样也有深厚的“国学”根底，传统文化对他们的滋养依然是非常突出的。对于传统文学精神的承传，是不自觉地内化在他们意识深处的，涉及文学思潮的择取，他们秉承前人遗教，重在现实主义一头，也是势所必然。

第四，中国作家强烈的现实主义使命意识，也来自马克思主义的影响。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精神是承负改造社会、改造现实的历史使命，这同文学思潮中的现实主义精神最为切合。坚持现实主义，可以说是马克思主义文艺观的核心，恩格斯的现实主义理论一直被认为是对现实主义的最经典性阐释。中国新文学作家对马克思主义理论的认同，也是从新文学开创期就开始的，李大钊在《什么是新文学》中提出新文学应以一定的“主义”和“学理”为指导，开始将马克思主义的理论指导引入中国新文学建设，此后许多革命文学作家也一直为此而努力，至“左联”时期，马克思主义理论（包括现实主义理论）的翻译、介绍达到高峰，解放区文艺和建国以后的文学更是将马克思主义文艺思想规范化。由是观之，马克思主义文艺思想渗透在中国20世纪文学的全程中，必使现实主义在中国有着十分显赫的地位。另一方

面，中国新文学接受外来文艺思潮，苏俄文学的影响不能低估。作为坚持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的社会主义国家，苏联文学对中国新文学有着极大的影响力，苏联的各种现实主义文学理论几乎都被介绍到中国，特别是在苏联长期居于正统地位的社会主义现实主义，从30年代开始被引入中国后，也一直被认为是最理想的文学思潮而接纳与推行，建国以后更使之成为一种官方意识形态要求所有的作家一体遵行。在这种情况下，现实主义就不只是一种思潮，而且还成为一种原则、一种规范，它在中国20世纪文学思潮中的影响之大，是完全可以想见的。

这一切都表明，现实主义作为20世纪世界文学中仍有极大影响力的文学思潮，在中国有着特殊重要的地位，的确是我们新文学研究中必须切实面对的。需要面对，并非因为其造就了何等的丰功伟绩，恰恰是因其确实有着值得面对的东西：无论是其提供的经验还是教训，对于中国新文学的发展都是一份极其宝贵的财富。就上述产生现实主义的诸种原因剖析，现实主义在中国长盛不衰并非都是合理的，而将现实主义“定于一尊”也不是中国新文学发达的征候，更何况，中国新文学中的现实主义就“纯度”而言也还存在不少问题，许多号称现实主义的理论创作同原本意义上的现实主义精神相去甚远。但这一些不应该成为我们不去切实面对的理由，或许正可以说，正因中国新文学中的现实主义是一种复杂性存在，才更显示出它的独特的研究潜力。

二 从形态切入：文学思潮研究的可取视角

现实主义文学思潮研究的复杂性是在于：无论是作为文学思潮或是作为创作方法，“现实主义”都是一个最不确定的名词。它在19世纪的欧洲兴起，就是“悄悄地走上历史舞台”的，同

18 世纪掀起狂飙突进的浪漫文学运动从而诞生浪漫主义文学呈现出完全不同的态势，因而为现实主义“正名”也就有了无穷无尽的争论。看来，这样的争论是不可能有什么结果的，因为现实主义固然有其基本的内涵，但的确又不是用几条固定公式可以概括的文学概念，尤其不可用纯粹的“写作方法”之类去限定它。布莱希特说：“如果我们只原原本本地重复那些现实主义者的写作方法，我们就不再是现实主义者了。”^①可见他似乎更看重把现实主义作为一种精神去理解。

关于现实主义的定义，不在本书的讨论范围，我们无意于在名词上再作纠缠，这里只想指出：作为思潮性的文学现象看待，现实主义不只是一种创作方法，更重要的是一个哲学范畴、一种创作精神，甚至是一种人生立场、人生态度，其内涵应当是十分宽泛的。人们从不同角度把握现实主义，便有不同类型的现实主义文学，从而显出现实主义的丰富性和多样性。如果说，19 世纪欧洲现实主义文学思潮初起时，相对于古典主义、浪漫主义等思潮而独立存在的现实主义，其包括创作方法在内的思潮特征还表现出较为确切的特指性意义的话，那么到了 20 世纪，随着现代主义思潮的勃兴，经现实主义作家长时间的积累、创造，又融合多种创作方法与思潮，现实主义的内涵无疑是大为拓展了。有人认为 20 世纪是“泛现实主义”或“无边现实主义”的时代，这也许概括得不很精确，由此可能会产生不必要的歧义，但指出的事实是有相当合理性的。一位研究者仅据有限文献，就罗列出 29 种现实主义的名号，据说这还是很全面的，倘查阅更多文

^① 布莱希特：《人民性与现实主义》，转引自柳鸣九主编《二十世纪现实主义》第 239 页，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1992 年版。

献，不难列出更多现实主义称谓^①。我们认为这并不是—种异常现象。从现实主义的基本精神出发，就一个特定角度去把握它，各自喊出自己的独特的现实主义的声音，这就有了现实主义的丰富多样色彩。提出“无边现实主义”的罗杰·加洛蒂正是对固守—种现实主义——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理论发出挑战。他固然并不认为现实主义是—个随意性很大的名词，可以在它前面任意加上—个定语就成为—种现实主义，但的确指出了现实主义应该呈现出开放性态势。他是从发展的意义上对现实主义作出重新考量，说它是“无边”的，是指现实主义是—个不断发展着的概念，不要把其“边界”划得太死：“现实主义是无边的，因为现实主义的发展没有终期。人类现实的发展也没有终期。现实主义没有确定的码头，没有最终的港口，即使是以大卫、库尔贝、巴尔扎克或者斯丹达尔这些威名赫赫的名字命名的港口，也非最后的停泊所在。”^②加洛蒂的“无边现实主义”理论是颇遭非议的，其令人难以容忍的是把—切文学思潮（包括现代主义）都包容在现实主义范围之内，从而消解了20世纪文学思潮的丰富多样性，但他针对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唯我独尊，力图打破其—统天下的局面，指出现实主义应呈现出“没有确定”、“没有终期”的开放性姿态，赋予现实主义以新的意义解释，却还是颇有道理的。

20世纪现实主义文学的丰富多样性及其呈现的开放性态势，表明着在这一股文学思潮的统领下，有可能出现不同的现实主义范式与形态。从形态入手，当有利于对这一思潮的丰富内涵和复

① 周宪：《二十世纪的现实主义：从哲学和心理学看》，柳鸣九主编《二十世纪现实主义》第15-16页。

② 加洛蒂：《关于现实主义及其边界的感想》，《现代文艺理论译丛》1965年第1期。

杂表征作出完整把握与深层揭示。以往我们对中国新文学现实主义思潮的研究，大多从宏观的视角作整体性观照，缺少对其作细部结构的分析，因而这一思潮的内在规律及其多种走向往往含浑不清。对现实主义作形态考察，首先当然在于某种形态必须具备现实主义的质的规定性，即它必须符合现实主义的基本特质与精神，而透过此种形态作为现实主义“范型”意义的被揭示，也就有了对现实主义特质的深层理解。由于对现实主义内涵的理解不同，中国新文学创作中的现实主义表现形态各异，且因常常产生对这股主要来自西方的文学思潮的“误读”而在接受过程中出现变形与走样，因而对中国新文学中的现实主义的多样性和复杂性是必须进行认真辨析的。我国卓越的文艺理论家冯雪峰就曾分析过此种现象，并精辟指出：“中国现代文学的现实主义传统分别由鲁迅与茅盾各自开辟了一种传统”^①。这个论述仅仅指出两种形态的现实主义或许有所不足，但提出的问题对于我们是颇有启示的。其启示意义是在于：一方面，它提出了两种不同形态的现实主义，避免了对现实主义的“一锅煮”现象，以便于我们从不同层面去认识和把握现实主义，也有利于从不同角度总结中国新文学现实主义传统的经验；另一方面，它涉及中国现代文学中两种最有影响的现实主义传统的比较，将它们放置在同一平台上作不同的形态考察，它们各自的鲜明特色就会得到显著呈示。作为启蒙主义思想家的鲁迅同作为社会革命家的茅盾，因作家思考问题、关注现实的角度不同，自会有不同的现实主义关注点；同样，主要作为“五四文学”代表的鲁迅，同主要作为“三十年代文学”代表的茅盾，在不同的历史阶段也会对现实主

① 冯雪峰：《中国文学中从古典现实主义到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发展的一个轮廓》，《文艺报》1952年第15期。

义提出不同的使命要求。经过这样的形态展示与比较，不独呈现了现实主义的多姿多彩色调，同时也显示了现实主义的时代特征及其在不同历史阶段的合理走向。当然，中国新文学中的现实主义不只是鲁迅与茅盾两家，就现实主义的宽泛内涵考量，再对中国新文学作家的文学思想与创作实践作细部分析，还可以划分出更多的形态类型。我们在本书中论述了中国新文学中的七种有代表性的现实主义形态，也不一定就是全面的。但透过这样稍为细致、深入的剖析，各种形态的现实主义特质就有较为明晰的呈示，将它们汇成整体，由各个鲜明个体所映照的整个中国新文学的现实主义特色也会得到更显著的呈现。

从文学形态的角度切入，的确是现实主义文学思潮研究较为可取的视角。对现实主义定义的聚讼纷纭，说明这股“边界”相对宽泛的文学思潮确实很难用一个既定的词语去规范它，倒不如从文学形态类型中去找寻切合现实主义基本特质的东西，从而对其作出尽可能合理的解释。事实上，对现实主义作形态特征概括，由此去把握现实主义的不同特质及其丰富内涵，是许多研究者早就做过的。对于20世纪现实主义的发展有着深刻影响的两位西方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家：卢卡契和布莱希特，他们的现实主义观念是很不相同的，甚至还有相当程度的对立，有的研究者就从这两种现实主义的不同形态特征入手，剖析其各自形成的原因，指出其不同的价值取向，这对我们认识两种重要的现实主义范型便很有意义。^①我国学者阐述现实主义的源头不在19世纪，在时间上还应提前，也作过这样的论述：“真正的现实主义是西方文艺复兴以来资本主义社会的产物。不同时代又表现为前边加

^① 范大灿：《两种对立的现实主义观》，柳鸣九主编《二十世纪现实主义》第79页。

上不同修饰词的内容。莎士比亚是人文主义的现实主义，菲尔丁是启蒙主义的现实主义，巴尔扎克则归入实证主义的现实主义，以后又出现了社会主义现实主义及二十世纪形形色色的新的现实主义潮流。”^①这样的划界能否为人们普遍认同，可以暂置勿论，但其用以印证现实主义的概括力极强的“修饰词”来说明巴尔扎克以前也存在着现实主义的形态类型，应该说还是很有说服力的。在我国新时期文学研究中，也有论者对80年代一部分在创作上体现现实主义特色的作家划分为不同类型的现实主义：把蒋子龙、谌容、柯云路等归入“社会现实主义”，王蒙、茹志鹃、李国文等归入“心理现实主义”，邓刚、张承志、陆文夫、高晓声等归入“历史现实主义”，邓友梅、汪曾祺、阿城、贾平凹等归入“文化现实主义”等^②。这样的划分法曾招致较多非议，原因是在于80年代的我国文艺界已呈现出多种文艺思潮并存的格局，特别是现代主义文艺思潮的崛起已开始打破现实主义一统天下的局面，把当时著名小说家几乎都包容在现实主义的范畴内，的确是有些问题。但我们依然认为，就把握现实主义特质和作家创作的主导倾向而论，上述划分还是有一定道理，特别是对于我们认识现实主义形态的多样复杂性是颇有启迪意义的。这一些都给我们一种提示：展开20世纪中国现实主义文学思潮研究，从形态论角度切入，的确很值得一试。

三 中国新文学现实主义形态的多样复杂性

如果从文学思潮（而不是创作方法）形成的角度看，中国

① 刘纲纪：《现实主义的新认识》，《人民日报》1989年1月17日。

② 徐剑艺：《试论文化现实主义——新时期小说现实主义形态论之一》，载《当代文艺思潮》1987年第4期。

新文学的现实主义主要应来源于对西方文学思潮的接纳与认同，其“传入”的内容包括现实主义文学理论与创作实践两个方面。关于此种接受源与接受的途经、方式等，已为众多的文学史家和文学理论家反复论证过，此处可以不必赘述。这里只想指出的是，由于处在特定的社会历史背景下，因接受方式的特殊性而产生了独特的接受效应，由此也必然形成中国 20 世纪现实主义文学思潮的独特性和现实主义文学形态的多样复杂性。

就总体而言，中国 20 世纪文学接受外来文学思潮是以快速切换方式进行的。也就是说，面对西方先进的文学思潮，中国人总有一种翘首以待、急切期盼的心理，因而无论对于哪一种新潮，从引进到接纳到消化，都是在短时间内快速完成的。这突出地反映在两个时期：新文学的第一个十年和新时期文学的头十年。对此，曾有文学研究专家作过精当论述。创造社元老郑伯奇在总结中国新文学第一个十年的文学成就时曾写下过这样一段意味深长的话：“中国新文学的产生比日本相差还将近半个世纪。《新青年》才开始提倡白话文的时候，在西欧是象征主义已经到了末期，即在日本，自然主义早已失了威权。而《新青年》诸君子所提倡的，和十八世纪法国的启蒙文学，英国的湖畔诗人所抱的思想并没有大的差异”，“回顾这短短十年间，中国文学的进展，我们可以看出西欧二百年中的历史在这里很快地反复了一番”。^①无独有偶，半个世纪过去后，这样的文学现象几乎又重演了一遍。当代学者对我国新时期文学思潮急剧变化的描述，使用的几乎是同样的语言：“中国文学这十年的历程浓缩了世界文学近百年的历程，西方二十世纪所发生的文学流变，在中国近十

① 郑伯奇：《中国新文学大系·小说三集·导言》，《中国新文学大系·小说三集》，上海文艺出版社 1981 年影印本第 2 页。